



第二届西夏学国际学术论坛综述

杜建录

“西夏学国际学术论坛”是中俄人文合作委员会（副总理级）国际合作项目的重要组成部分，第一届在宁夏银川召开，第二届在甘肃武威召开。第二届论坛由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院、中国社会科学院西夏文化研究中心、甘肃武酒集团共同主办，与会中外专家120名，提交论文106篇，围绕西夏社会历史、语言文字、文献古籍、文物考古等领域展开热烈讨论。笔者仅对本届论坛发表论文的主要内容、创新点与不足，作一简要述评。

一

史金波《西夏时期的武威》，是本届论坛的开篇，该文全面搜罗目前所能见到的汉文、西夏文以及文物考古资料，对西夏时期武威的地位、政治、经济、文化、宗教、习俗进行系统的阐述。相关讨论还有王晓晖《西夏河西地区基层社会考察》、崔云胜《西夏建张掖龙王庙史迹考述》，另外，孙寿岭对西夏时期凉州的酿酒、制瓷作了探讨。

张多勇《宋代大顺城址与大顺城防御系统》、高仁《细腰葫芦诸寨地望考辨》、李永磊《从古渭寨到通远军——北宋御夏政策个案分析》，从北宋御边的角度，讨论了宋夏沿边地理问题，张文对大顺城址的考证，高文对细腰葫芦诸寨地望的考辨，均具有一定的创新意义。

汤晓芳《西夏两幅道教绘画的释文辨析及艺术评价》，对《玄武》母题、“骨灰罍”、“星座”人物和手持“不明”物、玄武身后“文臣”和“侍女”等进行考证辨析，纠正了目前学界的错误。公维章《莫高窟第465窟壁画绘于西夏补考》、史伟《西夏河西石窟壁画中的绿度母探源》，前者通过对莫高窟第465窟壁画风格渊源以及出土文物分析，补证莫高窟第465窟壁画绘于西夏，后者探讨了西夏河西石窟壁画中的绿度母问题。苏银梅、张惠霞《浅谈西夏文物中的花卉装饰艺术》，对西夏花卉装饰艺术作了归类分析。陈育宁、汤晓芳《西夏官式建筑再探》，系统地讨论了西夏官式建筑及其艺术特征，尤其结合图像和汉文记载，挖掘西夏文文献中陛阶、斗拱、石顶、琉璃、硃等建筑方面词汇的史料价值。

李宇峰《碑志所见辽代赴西夏外交使臣事略》，考证碑志所见两例辽朝赴西夏外交使臣，可补史阙。齐伟《浅议玉田韩氏家族对辽朝经略河西的贡献》，通过玉田韩氏家族担任西南面招讨使、西南面五押招讨大将军、西北路招讨使，讨论其对辽朝经略河西的贡献。该文的不足是没有交代玉田韩氏家族的来源以及如何改姓耶律氏的。许伟伟《〈天盛律令·内宫待命等头项门〉中的职官问题》、董昊宇《论西夏的“以赃断盗”——以〈天盛律令〉为中心》，是利用《天盛律令》中的资料探讨西夏政治法律。前者结合传统典籍对相关西夏职官进行讨论，使问题进一步深入，后者提出了“以赃断盗”的命题。

索弗罗诺夫《西夏语语法》绪论,在总结西夏语语音构拟、语法构拟以及词义揭示的基础上,概述了一百年西夏语研究史,同时附《西夏语虚词表》,对进一步研究西夏语言文字有重要的参考价值。林英津《试论西夏语的𐽄 sju^2 与𐽄 dzo^1 及其相关问题》,讨论了西夏语翻译佛经与“譬喻”相关的两个重要词汇,认为西夏语译者理解上古汉语,甚至直接生活在中古汉语的氛围里。张珮琪《论西夏语动词的态范畴》,通过对西夏语动词的态范畴分析,指出西夏语的态范畴只有自动态和使动态的对立,而不存在互动态。贾常业《西夏文齿音、喉音佚失字形结构的复原》,以《文海》、《音同文海宝韵合编》中字形结构为基准,按照结构原理,构拟复原出西夏文齿音、喉音佚失字形结构。孙颖新《贺兰山拜寺沟方塔所出佚名诗集用韵考》,认为该诗的作者的口语不属于学界通常说的“宋代西北方音”,而可能是陕西话。佟建荣《汉文文献中党项与西夏人名、族名异译字的语音分析》,通过对音分析,指出汉文文献中党项与西夏人名、族名同音异译字反映出的语音现象大部分与龚煌城先生的拟音相符。宋洪民《从八思巴字文献看〈蒙古字韵〉及元代北方官话中“观”系字的读音》、张重艳《黑城出土汉文文书量词初探》,前者通过八思巴字文献考察了〈蒙古字韵〉及元代北方官话中“观”系字的读音,后者对黑城出土汉文文书中的个体量词、集体量词、度量衡量词进行了归纳总结。景永时《西夏文数字化的现状与未来》、柳长青《西夏文计算机数字化现状与展望》,从不同层面探讨西夏文数字化。

西夏文献是本届论坛讨论的重点,聂鸿音《华严“三偈”考》,考释了西夏译本《注华严法界观门通玄记》卷尾的一段讲疏,指出作为解说对象的“三偈”,系来自此前不为人知的一个异本。索罗宁《白云释子〈三观九门〉初探》,考证了俄藏西夏文佛教文献《三观九门》的内部结构、基本内容、语言特色、佛教思想,指出它与另一篇西夏文献《洪州宗趣开明要记》比较接近。孙伯君《西夏文〈妙法莲花心经〉考释》,首次刊布了俄藏西夏文《妙法莲花心经》的录文,并参考鸠摩罗什汉译本《妙法莲花经》,对西夏文本作了全文翻译。胡进杉《西夏文〈七功德谭〉及〈佛说止息贼难经〉译注》,按经题、正文、尾题三部分,对西夏文〈七功德谭〉及〈佛说止息贼难经〉进行了译注,翻译部分先列西夏文,次为直译和意译,然后和藏文本对照。刘景云《西夏文〈十界心图注〉》,对俄罗斯艾尔米塔什博物馆东方部所藏西夏文刻本《十界心图注》进行释文和考证,指出该刻本是西夏早期的版本,对研究天台宗“十界唯心”的传承和西夏佛教的发展有重要价值。杨志高《国家图书馆藏西夏文〈慈悲道场忏法序〉译考》,《慈悲道场忏法》俄、中、英等国均有收藏,作者对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本的序进行了录文译考。苏航《〈圣胜慧到彼岸功德宝集偈〉梵藏夏汉本对勘研究》,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,对《圣胜慧到彼岸功德宝集偈》梵藏夏汉本进行了整理对勘。潘洁《黑水城文献中的豌豆小考》,考证出汉译本《天盛律令》卷一五《催纳租门》中的“黄豆”,当为“豌豆”。黄延军《俄藏黑水城西夏文〈佛说金耀童子经〉考释》,通过对编号为4738的俄藏黑水城文献残片解读,考证出该经为宋朝天息灾汉译本《佛说金耀童子经》的西夏译本。克恰诺夫《夏圣根赞歌》与《黑水城所出1224年的西夏文书》,前者对俄藏西夏文《夏圣根赞歌》进行录文、汉译,并进行了详细的注释和考证;后者是对俄藏西夏文《黑水城守城管勾持银牌仁勇告近稟帖》的考释,这两件文书是研究西夏皇族起源与黑水地区社会经济的重要资料。惠宏、段玉泉《西夏文医方“消风散”考释》,梁松涛、杨富学《俄藏911号医书第14-2药方考释——兼论西夏医药文献的来源及特点》,前者考释了俄藏西夏文医方《消风散》中的十二味药名,并进行录文和汉译文构拟。后者对911号医书第14-2药方进行考释,指出其来源于金刘完素的《宣明论方》。梁继红、陆文娟《武威藏西夏文〈志公大师十二时歌注解〉考释》,对武威市新华乡亥母洞石窟遗址出土的西夏文《志公大师十二时歌注解》进行释文考证,认为该文献是禅宗在西夏传播的重要资料,具有很高的历史文献价值和版本价值。崔红芬《武威博物馆藏西夏文〈金刚经〉及赞颂残经译释研究》,对武威博物馆藏西夏文〈金刚经〉及赞颂残经进行汉译考证。段玉泉《武威亥母洞遗址出土的几件西夏文献考释》,对武威亥母洞遗址出土的西夏文《大白伞盖陀罗尼经》、《德王圣妙吉祥之增胜慧觉总持》、《陀罗尼经集》进行了考释,并对《大白伞盖陀罗尼经》重新缀合。于光建、徐玉萍《武威博物馆藏6721号西夏文佛经定名新考》、韩潇锐《英藏黑水城出

土〈大手印引定〉残片考，分别对武威博物馆藏 6721 号西夏文佛经和英藏 or. 12380-3231 佛经残片重新考证定名。李晓明《英藏西夏文〈七宝华踏佛陀罗尼经〉的误定与考证》、于业勋《英藏西夏文〈华严普贤行愿品〉残叶考》、王龙《英藏黑水城文献〈法华经〉残叶考释》、邹仁迪《英藏西夏文〈大般涅槃经〉写本残叶考》，均是对英藏西夏文文献进行考释，或重新定名，或考证内容。王荣飞《俄藏西夏文〈德事要文〉与英藏 or12380-3919 文献的版本关系》，通过考证，认为二者是同一版本。杜建录、段玉泉《黑水城出土民族文字文献概论》，扼要介绍了黑水城民族文字文献种类、研究状况以及历史文献价值与版本价值。

黑水城汉文文献是本届论坛讨论的又一重点。孙继民《关于俄藏 TK225 号文书的朝代归属问题》，通过考证，认为该文书是金代文书，而不是宋代文书。李华瑞《西夏社会文书补释》，从宋史的角度，对部分西夏社会文书提出补证和认识，开拓了研究思路。陈瑞青《黑水城所出南宋初年施行敕书文书考释》，考证了《宋西北边境军政文书》中的两面敕书，认为该敕书就是宋高宗即位敕。杜立晖《关于两件黑水城西夏汉文文书的初步研究》，对俄藏黑水城《三司设立法度文书》、《违越恒制文书》反映的西夏职官进行了考证。毛永娟《黑水城所出〈窠庸献蝇拂子启〉考释》，通过考证，认为该文书是元代的礼帖，当定名《元窠庸献结织蝇拂子礼帖》。郭兆斌《对黑水城所出 H x 19072R 号文书的补考——兼论元代收养孤老程序及养老制度》，补证了黑水城所出 H x 19072R 号文书。韦兵《黑水城文献汉文普礼类型礼忏文研究》，通过对黑水城汉文文献中七个佛教普礼类型文本的考证，认为西夏佛教对敦煌普礼类型的礼忏文既有继承又有发展。彭海涛《黑水城所出八件佛经残片定名及复原》，对《中国藏黑水城汉文文献》8 件佛经残片逐一考证定名。宋坤《从俄藏黑水城所出〈慈觉禅师劝化集〉看宗萨佛教思想的世俗化倾向》，以俄藏黑水城文献《慈觉禅师劝化集》为中心，从传教对象的平民化，传教语言的通俗化，重视修行的实践化三方面，探讨了慈觉禅师佛教思想世俗化倾向。冯国栋、李辉《〈俄藏黑水城文献〉辽代高僧海山思孝著作考》，认为俄藏 TK323 中《往生净土偈》及 TK132《慈觉禅师劝化集》中所收得《人生未悟歌》、《未悟歌》皆为思孝作品。蔡伟政《黑水城所出元代礼仪文书考释三则》，考证出《中国藏黑水城文献》中的 3 件元代礼仪文书分别是祭祀宣圣、祭祀三皇和朝贺天寿节的礼单。

杨浣《〈蒙古秘史〉中的西夏》，认为蒙文史籍中有关西夏的记载，均为成吉思汗伐夏、西夏输诚、既而违约、最终亡国，这种编纂模式肇始于《蒙古秘史》。陈晓伟、肖乃钺《〈辽史·西夏外记〉“西夏纪事”探源》，对《辽史·西夏外记》的纪事进行了对比考证。翟丽萍《〈续资治通鉴长编〉人名标点勘误八则》，对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中几则西夏人名标点错误进行了订正，有助于准确认识相关历史事件。刘再聪《“炳灵”为藏语之音译之疑问》，对“炳灵”一词为藏语音译提出疑问，以求证西夏学界。李勤璞《藏文西夏开国神话》，讨论藏文文献中的西夏开国神，并与同类传说比较，指出西夏文化思想的来源丰富多样。克恰诺夫《西夏文本学》、赵彦龙《西夏公文程式初探》，前者介绍了对俄藏黑水城西夏文献的整理研究，后者探讨了西夏公文的程式。

彭向前《〈黑河建桥敕碑〉藏文碑铭补注》，通过对“都大勾当”一词的汉、夏、藏三种文本对勘，认为藏文འཇུག་པོ་ལྔ་པ་为总干办，而非驾前总管。周峰《甘肃合水安定寺石窟金代党项人题记考释》，考证出安定寺石窟金代题记中李氏家族为党项人，并讨论了题记所见的金代军事制度。陈玮《后晋定难军摄节度判官兼掌书记毛汶墓志铭考释》，指出毛汶家族世任定难军高级幕僚，反映了唐末五代定难军对中原汉族人才的重视和吸引。吴峰天《〈凉州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铭〉再认识》，对西夏碑的文字和格式进行了再考证。张玉海、张琰玲《〈打刺赤碑记〉考释》，指出《打刺赤碑记》又作《建怀戎堡碑记》，为研究北宋、西夏、青唐之间复杂关系的珍贵资料。

张宝玺《西夏瓜州旱峡石窟》，讨论了瓜州旱峡西夏石窟的位置、形制以及塑像与壁画保存情况。党寿山《被埋没的西夏千佛阁遗址》，通过对永昌县古建筑遗址的形制、题记的研究，认为该遗址是西夏时期的千佛阁，而非高昌王墓。孙寿龄《武威古城瓷窑是西夏官窑》，从瓷窑的规模、瓷器特点等方面，考证武威古城瓷窑是西夏官窑。蔡晓樱《从武威的西夏墓看西夏藏俗》，通过对武威发现的

七座西夏墓葬的分析,探讨西夏火葬的特点及其成因。党菊红《武威出土的西夏铜壶、铜观音像、石磨》、黎大祥《武威发现夏汉合璧铜象棋子》,分别介绍武威建国街西夏墓葬出土的铜壶、铜观音像、石磨和城区一中巷出土的夏汉合璧铜象棋子“士”。高辉《武威市博物馆藏西夏文献装帧》,介绍了馆藏西夏文献的几种装帧形式。牛达生《丰富多彩的西夏纸品》,运用文献记载和出土的纸,介绍了丰富多彩的西夏纸。赵生泉《西夏竹笔新解》,通过分析,认为武威出土的两支西夏竹笔源自吐蕃文化,属于藏笔。孙飞鹏《古代文献活字印本鉴定方法补正——以国家图书馆藏西夏文〈大方广佛华严经〉为例》,通过对比字符、对比复本的方法寻找活字。此外,唐均《黄振华先生西夏研究述评》、赵天英、陈虎《陈炳应先生对西夏学的贡献》,分别评述已故西夏学专家黄振华、陈炳应二位先生的学术贡献。

二

本届论坛有两个显著特点:一是与以往举办的西夏学研讨会和学术论坛相比,参与人数最多、提交论文数量最多,尤其是既有顶尖级的老专家,又有年轻的新面孔,一批西夏学硕士生、博士生参加论坛,并发表论文。由此可以看出,西夏学研究逐渐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,预示着我国西夏学研究进入了繁荣发展时期。二是讨论的问题越来越细,越来越深入,诸如官式建筑、开国神话、早峡石窟、堡寨地望、西夏时期的武威、西夏文献某个词语的翻译、西夏语某种语法形态、文献定名断代、绘画释文辨析,等等。在充分肯定成就的同时,我们还应看到存在的不足:

(一)对学术史的阐述不够。有的文章没有交待所研究领域的现状、前沿以及本人研究的贡献,看不出研究的创新点;有的文章研究内容国内外专家已有很好的成果发表或出版,而作者孤陋寡闻,当作创新问题在研究;有的文章在前人研究基础上进一步探讨,却没有交代清楚研究现状,搞不清楚哪些是前人的贡献,哪些是自己的创新。

(二)对文献断代分析不够。黑水城文献既有西夏文文献,也有汉文文献和维吾尔蒙古文、八思巴蒙古文、回鹘文、古藏文、阿拉伯文等民族文字文献。在时间上包括宋、西夏、金、伪齐、元(含北元)。因此,对没有纪年的文献或时代特征不明显的文献的考证断代,是研究的基础工作。但在具体讨论中,有的作者往往不加辨析,直接用作西夏或宋元资料,以致张冠李戴,以讹传讹。

(三)对多种版本佛经对勘不够。由于俄藏黑水城佛教文献尚未公布,在对西夏文佛教文献研究时,常常对容易见到的一种版本进行讨论,而不是对不同版本或残缺不一的同一版本进行对勘补正。资料占有的不充分,得出的结论自然有失公允。

(四)研究方法比较单一。就西夏文佛经而言,目前的研究大致从三个方面展开:一是参照汉文本,对西夏文本进行逐字对译和意译,并进行注释;二是在西夏文本翻译的基础上,或对散乱文献进行缀合,或对尚未定名或错误定名重新考证定名、或对不同文本或文种进行对勘;三是对西夏文进行本翻译,对散乱文献进行缀合,对尚未定名或错误定名重新考证定名、对不同文本或文种进行对勘,在此基础上,进行更深层次的探讨,进一步阐释西夏社会历史问题。

西夏学问题,实际上是历史问题,西夏的语言是历史语言、西夏的文献是历史文献,他们研究的终极目标不是就语言而语言,也不是就文献而文献,而是利用语言研究成果和文献研究成果,揭示西夏社会历史面貌。上述西夏文献研究三个层次是一种递进关系,第一层次属于学习和初步研究,第二、三阶段属于进一步研究阶段。虽然目前大部分研究成果停留在第一二层次上,即止于解释文句,而不能讨论问题。但欣慰的是如此多青年学子加入到西夏文献研究队伍,真乃可喜可贺!可以预见,对已发现的西夏文献作史学上的进一步阐释,未来会成为西夏学新的生长点。

史学大师王国维提出“纸上之材料”与“地下之材料”二重证据法。陈寅恪先生在《王静安先生遗书序》进一步归纳和总结为三个方面:“一曰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。凡属于考古学及上古史之作,如《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》及《鬼方昆夷獯鬻考》等皆是也。二曰取异族之故书

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。凡属于辽金元史事及边疆地理之作，如《萌古考》及《元朝秘史之主因亦儿坚考》等皆是也。三曰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。凡属于文艺批评及小说戏曲之作，如《红楼梦评论》及《宋元戏曲考》、《唐宋大曲考》等皆是也。”（陈寅恪：《金明馆丛稿二编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0年，第219页。）今日之西夏研究，不仅要取地上传世资料与地下出土资料互证，更要取汉文西夏文献与西夏文西夏文献互证，同时参考出其他民族文字文献和实物资料。毫无疑问，运用多重证法，是提高西夏研究水平的重要途径。

（作者通讯地址：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院 银川 750021）